



司馬遷與華夏文化叢書

與中國文學

史記卷六

漢

太

史

令

司馬遷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翺集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馬貞索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守節正義

秦始皇本紀第六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

莊襄王者孝文王之中子也名子嬰後為華陽夫人嗣夫人

是人因改莊襄王為秦

名子嬰也莊襄王為秦

貴臣往為質音直

及貴臣為質如上音國弱權其侵伐令子及

之

亦為交質音致左傳云見呂不韋姬悅而取

生於邯鄲

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

與趙河間以趙

正也始皇以正月

死政代立為秦王當是之日

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都

郡以來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不

王

張新科 著

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

张新科 著

史记与中国文学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4 号

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

《史记》与中国文学

张新科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陕教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25 印张 156 千字

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7-5419-6195-7/G·5443

(简精装)定价:8.90 元

序 言

董 继 昌

中国有世界文化名人司马迁，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陕西乃司马迁的故里，这更是陕西人民的光荣。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三秦研究司马迁的学者们组织起来，成立了“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开展有计划的群体性研究，这在司马迁研究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先例。研究会成立后，研究工作迅速铺开，仅两年多的时间，大型工程《史记研究集成》已正式动工，大型电视专题片《司马迁万里行》已开机拍摄，大型丛书《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第一集已顺利完成，这亦是史无前例的壮举。对这些可喜的事功，我感到十分欣慰和由衷的高兴！这里仅就即将付梓的《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说几句话。

《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共28本，包罗天、地、人、物系统知识，从《史记》百科全书这一广阔的领域内揭示出司马迁与中华文化的密切关系。过去，人们通常赞美司马迁是位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或再以“史圣”誉之，这都不足以全面体现司马迁在中国文化史上真正的崇高地位。司马迁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郭沫若先生曾以“功业追尼父”称颂，认为是孔子之后的另一位文化巨匠。这是一点不假的。事实上，司马迁本来就是以继承孔子而自许的。他在《太史公自序》中写道：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正是为了不辱父命，继承孔子伟业，司马迁便坚定地肩负起效法孔子著《春秋》而写《史记》的崇高使命。对于《春秋》，司马迁不单单看作是一部“史”书，而视之为“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文成数万，其指万千”，旨意高远、内容丰富的纲领性的文化经典。他的《太史公书》亦绝非一般“记言”“记行”的史官之举措，而是在“纂史记石室金匱之书”的基础上，要写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而这“一家之言”，不仅“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补六艺之不足，较之《春秋》，意欲要突破和超越是非常明显的。

司马迁以孔子之后的文化领袖自许，决心写出胜过《春秋》的《史记》，并未狂言欺世。论《史记》的成就，不管从中国历史长期已行的实践性，或从集文化之大成的广博性和从领风气之先的进步性哪一个方面而言，较其前人，都是后来居上之佼佼者。如以实践而论，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行之有效的外儒内法的政体，并非是孔子思想的体现，实则以司马迁崇儒而不弃法的思想所构建；上层文化领域内百家竞流的实际，也非孔子一家的独行，而是司马迁“整齐百家”的再现。论其文化知识面的广博，李长之先生誉司马迁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其巨著《史记》当然也就是“百科全书”类的宝藏了。《史记》除了囊括孔子所致力诗、书、礼、乐之外，又融汇百家学说于一炉，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民族、民俗、特别还有天文、地理、医学、科技等；而且并非停留于孔子“述而不作”的整理介绍阶段，力求作到“通古今之变”的论述，让

人们“原始察终”充分认识其历史源流的发展变化。论其文化思想的进步性，且不必详列对各科文化的卓识远见，仅就政治上不提倡“克己复礼”，而在总结“承敝通变”的基础上大力颂扬革新进步；经济上不重本抑末，而提倡创造财富发展商品经济；在国家的统一上，不囿于“华夷之分”的狭隘圈子，而提倡华夏各民族都是黄帝子孙的诸民族大一统的崇高思想；对外不是闭关自守，自我独尊，而是竭力介绍域外物产，让人放眼更广阔的天地。诸如这些思想认识，不仅在两千多年以前是十分杰出的、领先的，即如在两千年以后的今天，亦是闪闪发光，仍具有相当生命力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司马迁是位当之无愧的华夏文化巨人，其文化思想精髓，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真正代表。

令人欣慰的是，丛书的组织和编著者，充分认识到司马迁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及其崇高地位，不再囿于史学、文学范围的研究，推而广之，努力开拓新的领域，着眼于多层面全方位的探讨。如此全方位深化司马迁的研究，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尤其富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充分探讨《史记》的丰富意蕴，总结两千多年的人事盛衰、存亡、成败、得失的宝贵经验，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具有积极借鉴作用；科学评论司马迁的崇高精神及对文化的巨大贡献，让人们为有如此震古烁今的文化巨人而自豪，本身就具有产生爱国主义情操的强烈感染力；重视阐明司马迁对华夏文化的丰功伟绩及进步思想，既能使人们正确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也非常有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丛书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所收集的各家的论著，不强求观点的一致，这也体现了司马迁的治学精神。学

术研究要发展，不可能没有争议，更何况对司马迁展开全方位的研究，确属开创性的事业，更需要各抒己见，互相争鸣。

司马迁竭尽毕生精力所撰写的《史记》，总结了中华二千多年的古代文明，是第一部集华夏文化大成的百科全书，其博大精深的内容，需要集中更多人的智慧，花更多精力来不断研究。因此，我热切希望更多的学者和海内外热爱华夏文化的仁人志士，投身于司马迁的研究，为弘扬华夏文化做出贡献。也希望以此为契机，继续前进，把陕西逐步建设成司马迁研究基地。

1994年国庆前夕于西安



作者简介

张新科,男,汉族,陕西眉县人,生于1959年8月13日(农历),1986年陕西师大中文系研究生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该校中文系副教授、史记研究室副主任,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副秘书长。一直从事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出版《史记研究史略》(合著)、《中国古典传记论稿》(合著)等著作,主编、参编著作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近30篇。

目 录

一	司马迁的文学思想及其影响	[1]
1.	对前代文学思想的继承	[1]
2.	司马迁的文学观	[6]
3.	司马迁文学思想的影响	[15]
二	《史记》与中国古典散文	[22]
1.	集先秦散文之大成	[22]
2.	《史记》散文的新成就	[26]
3.	千秋宗匠 不朽典范	[39]
三	《史记》与中国古典传记	[47]
1.	《史记》以前传记的发展	[47]
2.	《史记》对中国古典传记 的贡献	[57]
3.	《史记》对中国古典传记 的影响	[74]

四 《史记》与中国古典小说……………〔82〕

1. 《史记》与古代小说的渊源
 关系……………〔82〕
2. 形象化的人生……………〔88〕
3. 立体化的叙法……………〔92〕
4. 戏剧化的场面……………〔95〕
5. 小说对《史记》艺术的发展…………〔98〕
6. 《史记》与古代戏曲……………〔101〕

五 《史记》与中国抒情文学……………〔105〕

1. 《史记》是一部宏伟的史诗…………〔105〕
2. 司马迁的史诗与杜甫的诗史…………〔113〕
3. 《史记》与中国抒情文学……………〔118〕

六 《史记》与中国古典悲剧……………〔122〕

1. 《史记》悲剧的范畴与类型…………〔122〕
2. 《史记》的悲剧精神与悲剧
 效果……………〔126〕
3. 《史记》的悲剧艺术与结构
 特征……………〔130〕
4. 司马迁的悲剧心态与悲剧
 时代……………〔134〕
5. 《史记》与中国古典悲剧……………〔141〕

七 《史记》与中国浪漫主义文学

- [145]
- 1. “带着镣铐跳舞”——实录基础
上的想象 [145]
- 2. 司马迁“爱奇”的倾向 [153]
- 3. 《史记》与中国浪漫主义文学
..... [160]

八 《史记》与屈赋 [165]

- 1. 《史记》与屈赋精神实质
纵谈 [165]
- 2. 司马迁的辞赋理论与实践
..... [179]

九 《史记》与中国民间文学 [184]

- 1. 《史记》向民间学习什么 [184]
- 2. 《史记》中的民间歌谣谚语 [188]
- 3. 民间文学从《史记》得到什么
..... [193]

十 《史记》——中国文学语言的宝库

- [197]
- 1. 对先秦语言的总结与发展 [197]
- 2. 《史记》语言的成就 [202]

3. 《史记》是中国文学的语言宝库	
.....	[217]

结束语	[220]
-----------	-------

司马迁的文学思想及其影响

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的的贡献有两大方面：一是以自己的文学实践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宝库；二是他有明确的文学观点。司马迁的文学观是与他的政治观、史学观、美学观等紧密相联的，不仅在当时的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对后代文艺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对前代文学思想的继承

司马迁的文学观是在继承和批判前代文学思想基础之上产生的。前代文学思想对司马迁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1 美刺原则

这是儒家诗论的重要方面，“美”就是歌颂，“刺”就是讽谏，这是文学的功用和目的。

早在《诗经》中，就有这样明显的目的：

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中伯。

——《大雅·崧高》

吉甫作诵，穆如清风。

——《大雅·烝民》

维是褊心，是以为刺。

——《魏风·葛屣》

家父作诵，以究王诟。

——《小雅·节南山》

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对“美”“刺”的产生有这样的认识：“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孔子也曾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认为文学作品可以“怨刺上政”。但在儒家诗论中有一个要求，“刺”要“中和”，不能过分，这是孔子提出的“中庸”之道（《论语·雍也》）在文艺上的反映，也就是说，“怨刺”必须是“温柔敦厚”的，必须“止于礼”。后来的荀子继承了这种思想，提出“乐中平”及“乐之中和也”（《荀子·劝学》），等等。“汉儒论诗，不过美刺两端”①，《诗大序》集中表现了这一点（关于《诗大序》作者，人们有不同看法，今可看作是先秦儒家诗论的总结）：“美盛德之形容”，“上以风化下，下以讽刺上，主文而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任何“刺”都不能过火。“美”“刺”成为文学的主要功用，这不仅在先秦，而且在后代都得到人们的承认，司马迁对此既有继承，又有扬弃，形成了自己的“非中和”文学思想。

1.2 言志抒情

关于文学的性能，司马迁以前的文学理论涉及到的是“言志”和“抒情”。《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赵文子对叔向说“诗以言志”；《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荀子·儒效》篇说：“诗言其志也。”《尚书·舜典》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大体上也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所谓“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也就是指人的思想感情。“情”与“志”实为一体。《乐记》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即：音乐是内在情感表现于外的结果，艺术是感情的表现。唐代孔颖达在《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的《正义》中也解释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文学是用来表现人的思想、感情的，一部文学作品如果没有明确的思想、充沛的感情，就不会感动人，不会发挥它的作用。司马迁对先秦时言志抒情的文学思想作了进一步发展，把“成一家之言”作为自己的修史目标，也作为他的文学追求。“一家之言”就是言志抒情的最好表现形式。

1.3 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

先秦儒家音乐理论的总结性著作《礼记·乐记》提出诗乐创作“感于物而后动”的观点：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声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者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蝉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

这些理论认识到现实是产生音乐（文学）的基础。不仅如此，先秦文论中还认识到文学反映着现实。《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季札观乐，通过诗乐所反映的内容情调来观所谓风俗之盛衰，也就是孔子所说“兴观群怨”之“观”。《礼记·乐记》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文学与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文学来源于现实，又反映现实。这在先秦时期还是一种朴素的认识，到了司马迁，在此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形成了他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思想和创作实践。

1·4 文质关系

孔子关于文质关系的言论有：

文犹质也；质犹文也。

——《论语·颜渊》

辞，达而已矣。

——《论语·卫灵公》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论语·雍也》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情欲倍，辞欲巧。

——《礼记·表记》

综合这些说法，孔子是要求在重视内容的前提下，同时重

视文采辞藻。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玉杯》中对此有进一步阐释：“志为质，物为文，文著于质；质不居文，文安施质？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春秋》之序道也，先质而后文，右志而左物。”《淮南子》一书也主张“必有其质，乃为之文”（《本经训》），认为质较之于文是根本的东西，这同儒家思想是一致的。当然，《淮南子》是把“质”看作是包括物质生产在内的整个社会状态的产物，是事物不假文饰、天然具有的美。司马迁以前的文学观念，总体上是先质后文的观念，这对于司马迁“文史结合”、“文质结合”的文学思想深有影响。如何运用文学的手法去展现千变万化的历史、表现丰富多彩的内容，这是史学家、文学家的司马迁遇到的一个实际问题，但他正确地处理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使《史记》成为文史结合的典范，也成为文质结合的典范。

1·5 发愤抒情

屈原在《九章·惜诵》中说：“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屈原热爱祖国，忠于国家，反受党人谗毁，被赶出朝廷，他心中充满了忧愤，忧国家，忧自己，于是把胸中的不平之气吐之于辞，形成了“发愤抒情”的思想，这是文学创作的动力。这对司马迁产生了很大影响，司马迁正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提出了“发愤著书”理论。

1·6 知人论世

这是儒家大师孟子的诗论主张。他在《万章下》中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一个作家的作品，总是和他个人以及他所处的时代相联系着的，要真正理解一部作品，就必须“知其人”、“论其世”。孟子的这一批评方法无疑是精辟的。司马迁是这一批评方法的继承者，我们看《史